



1905年,瞿秋白到常州觅渡桥冠英小学堂求学。图为瞿秋白在冠英小学上过课的教室。
新华社资料片

草地 百家谭

梁衡

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真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契合,那么一个人与一座城呢?

如果让我在故乡之外再举出一座交往最多的城市,那就是常州了。常州人待客时常说一句话:“常州,常州,常回来走走。”而我自第一次去常州做客之后,常来常往不觉已30年。

像许多有缘人的故事一样,第一次结缘总是偶然。那还是1990年5月,当时我在国家新闻出版署工作,因公去处理一张报纸的创办事宜。事毕,我问常州有什么名胜可看。主人,即那张报纸的筹办人王荣泰先生说:“有。小小常州城出了三位共产党的早期领袖:瞿秋白、张太雷、恽代英,都有故居和陈列馆在。”我们就信步来到瞿秋白纪念馆。瞿是继陈独秀之后党的第二位最高领导人。

纪念馆是一座老祠堂,也即瞿秋白的故居。原来,当年秋白家道中落,已穷得居无片瓦,就寄住在瞿家祠堂里。我参观过后深为秋白的家世之苦和人生坎坷所动,心情正处在压抑、悲恸之中。时已黄昏,老屋旧院,暮云四合,周围显得有几分凄清。突然院子里出现几个孩子在打打闹闹地扫地干活,脖子上的红领巾飘动着,如闪闪的火苗,为这所老宅增加了几分生气。

我问:“哪里来的小学生?”答:“旁边有一所小学,学生常来纪念馆义务劳动。”“什么小学?”“觅渡桥小学。”“觅渡”二字让我心头一惊!一般地名多是张家巷、李家桥什么的,怎么会这样文雅的名字?令人想起李清照的“寻寻觅觅”,或屈原的“上下求索”,更联想到秋白临刑前的那一篇《多余的话》,他一生都在寻觅生命的渡口。我便问这个地名起于何年,答曰:“至少清代嘉庆年间,瞿家祠堂前就有一条河,河上有桥,名觅渡桥。到上世纪‘备战备荒’时,河已干涸而改建成防空洞,洞上修路,就是现在的这条市中心马路。”啊,200年前就有“觅渡”二字,难道真有什么谶纬之说,真的就一谶成真了吗?而且竟又长留此名,以为历史之索引。

就这一点缘起,打那之后我几乎每年去一次常州。“我在这间旧祠堂里,一年年地来去,一次次地徘徊。我想象着当年门前的小河,河上来往觅渡的小舟。秋白就是从这里出发,到上海办学,去会鲁迅;到广州参与国共合作,去会孙中山;到苏俄去当记者,去参加共产国际会议;到汉口去主持八七会议,发起武装斗争;到江西苏区去,主持教育工作。”六年后我终于写成《觅渡,觅渡,何处行》(以下简称《觅渡》),很快被广为转载,并入选中学课本。我亦被聘为瞿秋白纪念馆名誉馆长。2005年6月在秋白就义70周年时,这篇文章又刻石勒碑立于纪念馆院中。翠竹绕石,桂花飘香(秋白出生的老屋名八桂堂),游人肃然。我陪同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先生来参加活动。2016年全国党史、新闻出版及文学界学者又专门在常州举办《觅渡》一文发表20年研讨会,怀念秋白,研讨觅渡精神。正如文章最后一句话所说:“哲人者,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。”“觅渡”成了概括秋白悲剧人生的最好的文学意象,又是一种诚实人格与探索精神的象征。常州街头甚至出现了以觅渡为名的商店。

王荣泰先生见此灵机一动,就想何不注册一个公司专门推广觅渡文化。谁知,早有人先他一步。网上一查,全国竟有了100多个以“觅渡”为名的公司、中心等,“觅渡”早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。真可谓“觅渡,觅渡,惊起一片鸥鹭”。于是他决定在常州,这个“觅渡”的发祥地成立一座觅渡书院,弘扬觅渡精神。在筹备过程中,远在湖南的一位宣传干部一定要求参加,原来她的网名就叫觅渡。而甘肃的一位才20岁的在校大学生网名也叫觅渡,可见文

常州城里觅渡缘

传风走,秋白精神不知已静悄悄地打动了多少人的心。广西某地产一种玉陶,竟送来一个大陶瓶,上刻《觅渡》全文。而远在新疆的一位朋友听说要建觅渡书院,竟从数千里外寄来一段沙漠里的老胡杨木,借以歌颂秋白之坚韧,上面题刻:“大漠胡杨,春风玉关。”“觅渡人生,来到江南。”“觅渡书院”成立之时八方来客,好不热闹。觅渡成了常州城的文化符号,又辐射到了全国。

因为常来常州,就想到了秋白之外,这里还有哪些文化名人。稍一打听,竟多得数不过来。历史上的常州包括现在的无锡、宜兴,直达太湖之滨。大运河穿城而过,商业繁荣,文人云集。龚自珍的诗《常州高才篇》说:“天下名士有部落,东南无与常匹俦。”文人名士已多得不胜其数,曾产生过1900多位进士、9个状元。名声最大的当然是苏东坡了,他被贬海南赦归之后,便在常州买了一块养老之地,可惜命运不济,很快去世,要不然定会是这个“部落”的大当家。其余还有那个写有名句“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”的宋末词人蒋捷。近现代人有盛宣怀、李公朴、赵元任、刘海粟、周璇等,都是谁人不知、哪个不晓的人物。新中国成立后常州又出了57个院士。就说这个觅渡桥小学吧(简称“觅小”)也名声赫赫,它是秋白的母校且不用说,竟还又出了6个院士。现在已是“觅渡教育集团”,有6000名学生,规模宛如一所大学,泱泱一江南名校。行文至此顺便讲一个笑话,我因与“觅小”的孩子当年结缘一面,才有了《觅渡》一文的流传,学校就赏我一个名誉校长,并正式颁发了聘书上网公布。一天忽然收到一封家长的来信,说孩子到了上学年龄,“觅小”门槛甚高,一“额”难求,求我这个“校长”开个后门。他哪里知道我只是挂个空名,但这倒说明“觅小”的影响之大。

因为《觅渡》一文的传播,觅渡桥这个老地名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。但是时势所移,原桥早已不见。常州本是大运河上的一座水城,历史上石桥无数。若能再找回一座承载有浓浓的地方文化的老桥,重续200年前的历史,也是一段佳话。这个念头一出,就成了两个当事人,觅渡书院院长王荣泰与“觅小”校长吴毅先生的心病。他们前后3年翻查资料,探访旧人,总算弄清了原桥的位置、式样,又请人设计施工。已经消失了200年的觅渡桥穿越历史风雨,将重现于现代都市,静静地卧于秋白纪念馆与“觅小”的门前,向人们叙说如烟的往事。缘分这个东西真是说不清,当年若是不碰见那几个红领巾,怎么会知道觅渡桥;若没有觅渡桥,怎么会有《觅渡》文;若没有《觅渡》文,我怎么会与常州有了这许多扯不断的情?现在要重修旧桥,我当然脱不了干系,他们就请我写了一篇《觅渡半桥记》刻于桥头,以记缘起。记曰:

岁月流逝,山河易位。清嘉庆年间常州城内有一条城子河,河上有座觅渡桥。年荒日久,河桥早废,几无人知。幸好桥边有一所觅渡桥小学,为老常州保存了一个旧地名。小学曾是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的母校,桥下的瞿家祠堂亦是秋白的故居。他当年就是踏上这座桥走上革命道路的。觅渡桥见证了中国和常州的一段近现代史。

为留住历史记忆,常州《中国剪报》社与觅渡桥小学发起重修觅渡桥。但原桥早已被穿城大街切去一半,车水马龙,旧景难再。于是别生创意,仍在北岸原址建桥,腾空向南戛然而止,是为半桥。时空穿越二百年,瞬间定格在一时。时人轻抚桥栏,念天地之悠悠,感时代之变迁。行百里者半九十,后来者当更起宏图,长虹万里架到天外去!

算来,自我第一次来常州已经整整过去了31年,而《半桥记》与《觅渡》两文也已相隔25年。鲁迅曾手书一联赠瞿秋白: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,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”。常州于我虽是一座城,却也配得上同怀知己了。人生能有几个二十五,几个三十一?

当我们谈论书院时 我们在谈论什么?

草地 专访

本报记者许晓青

从《书楼探踪》《书楼探踪》到2020年由海人民出版社推出《书院寻踪》,我国当代传奇藏书家韦力佳作不断。

在这位藏书家看来,书院是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载体。中国的书院历史十分悠久,成为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,在中国教育史上有较大影响力。在教育之外,书院还承载着书籍流传、文明传承等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。

历时7年多,韦力寻访中国古代著名书院的遗迹、遗踪,亲临实地勘踏考察,考订史实和掌故,以游记形式聚焦北京金台书院、河北莲池书院、山西石芸轩书院、长沙岳麓书院、浙江万松书院、浙江紫阳书院、陕西正谊书院等57座古代著名书院的遗址。

“打开”书院的正确方式

“凡与书沾边之事,都令我会像蛇吞象般列入寻访计划之中,足吾所好,忘吾力穷”。韦力如是说。

从芷兰斋书店寻访三部曲《书肆寻踪:古旧书市场之旅》《书坊寻踪:私家古旧书店之旅》《书店寻踪:国营古旧书店之旅》,到耗时4年遍访典籍中记载的163座古代个人藏书楼的《书楼探踪》《书楼探踪》,再到对几十位古代藏书家之墓及古代遗址寻访,进而写成《书魂寻踪》,新近这部用7年多时间寻访中国古人的著名书院遗迹而写成的《书院寻踪》,是韦力先生锲而不舍、辛勤耕耘的一种“读书”方式。

简言之,有了书院这座“桥梁”,藏书家从“藏书”出发,上下求索,又回归“藏书”。

《书院寻踪》是韦力2020年首部与读者见面的书。韦力谈到,《书院寻踪》是一部将游记、掌故、史料结合在一起的书,不会因为纯粹游记性的抒情,而觉得太寡淡,也不会因为史料性太浓而觉得只有参考价值,进而完整地保存阅读的愉悦感。

有媒体点评,韦力的一番作为,是想通过系统、专门地介绍各地书院的藏书,让读者理解藏书才是书院的“正根儿”。

从书斋珍藏到“田野”考察

——对话藏书家韦力

本报记者许晓青、董雪

草地:您是当代知名藏书家,藏书、爱书本身,与探访古代书院遗址有哪些内在关联?

韦力:今天的古代书院遗址已与当年的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,不可能在遗址上寻觅古籍。探访书院遗迹,更多的是通过这个活动讲述曾经的一段重要历史,我并没有抱希望在那里得到更多的藏书。

但任何事都有内在关联性,正是因为我喜欢收藏古籍,使得我对传统文化有了别样的亲切感,你可以认为这就叫“爱屋及乌”。与传统文化有关的方方面面,我都会感兴趣。尽管传统中有精华有糟粕,但择善而取之,还是有用之不竭的优点在。通过收藏典籍,我注意到古代书院的刻书与藏书;通过书院史的梳理,我了解到中国传统文脉延绵不绝,古代书院起到了重大作用。近些年来,不少学者专家注意到这一点,比如岳麓书院的邓洪波先生,他搜集大量书院史料,出版多本专著,系统梳理了书院文化的历史。

出于各种原因,关于古代书院的状况,当今学界主要停留在史料梳理及研究方面,少有人进行系统的实地考察。书院既然在传统文化史上有这么重要的地位,应当通过田野调查,系统考察各地书院的留存状况,以便了解哪个地区集中了多少家书院、每家书院有什么特色,这些书院对于当地文化有怎样的影响。我认为,只有通过实地探访,才能将这些观念有机结合,形成更加立体的认识。

草地:您以寻访书院来丰富您对藏书的整体性研究。在您看来,梳理书院历史何“反哺”藏书研究?

韦力:其实古代书院跟藏书有密切关系,比如唐代元年间创办的丽正书院,其原本的功能只是藏书。只是因为古代书籍珍贵难得,大多数买不起书,而官府藏书没有资金方面的压力,所以能够聚集丰富的典籍。文人都想方设法到书院去看书,也必然会探讨书中内容,因此书院就渐渐成了学问研讨之地。这一过程中又会积累了大量库存。

韦力透露,《书院寻踪》是7年寻访的部分成果,记录了57家书院,而他总计踏足的书院及其遗址多达100余处。

“寻访”要提前做功课。“有的书院,光资料我就查了好几年。所有的寻访基本都是有计划的。有备而来,而非一时兴起。”他说。

近代史上,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,传统书院体系也不得不“辞旧迎新”。书院被改造成各级学校,书院的性质也随之改变。算起来,书院在我国也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但是,韦力认为,书院在历史上的作用很大,因为它曾经存在了上千年。去寻访这些遗迹,目的就是为了去记录一段重要的历史,它是中国藏书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更何况书院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。

藏书人的初心“照见”书院藏书

“如今,许多书院都没有痕迹了,寻访就难在这儿,你能知道那些东西很有价值,但是你找不到它。那么为什么还要寻访书院?”

韦力在2020上海书展上自问自答。他说,因为书院和藏书史有关。他认为,在中国古代,教学并不是书院的唯一功能。我们现在一谈到书院,本能地把它想成一个教学的地方。这个概念源于宋代,当年朱熹到书院讲学,所以渐渐地把书院变成了一个以讲学为主的地方。

但韦力提出,书院最初的功能是藏书,放入藏书史去研究,才豁然开朗。比如,唐代的官办书院,建好之后,中央或者地方政府要在那里藏书。随着藏书的丰富,越来越多的学人会集中到书院读书。在读书的过程中,他们各抒己见,对读书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研讨,书院也因此逐渐成为研学的地方。这就是后来那么多文人集中在书院的原因。教学功能后来居上,藏书功能被掩盖起来。

他还提出,虽然中国古代有官府藏书,但官府藏书主要是服务官僚体系。私家藏书楼则基本服务于家族内部。但书院藏书不同,这种藏书方式具备了公共图书馆的雏形,因为它是对公众开放的。如果追溯中国现代图书馆的起源,可追溯到古代书院,而不是藏书楼,这是大家很少提及的。沉淀下去研究,还会发现书院藏书以儒学经典为主。中国历史典籍流传至今,绝大多数是儒家经典,所以说

书院藏书才是公共图书馆藏书品种丰富的源头。

这就是书院藏书与藏书楼藏书不同的地方。和藏书楼不同,即使书院是私人所办,它也带有半公开性质。有的书院虽然名义上招收同姓子弟,但是基本上不会拒绝外姓学子,所以说古代书院更具有公共性质。因此藏书史上必须单独列出一个门类来,不能把书院混在藏书楼里面,因为它们性质不同。

韦力还提出了大胆的体系建构,他认为,中国古人的藏书一般分为官府藏书、宗教藏书、私人藏书和书院藏书,这四个部分加起来构成中国藏书史的完整体系。而我们在谈藏书史的时候,重点叙述的就是官府藏书、宗教藏书和私人藏书,很容易忽略书院藏书。

传承书院藏书的精神之根

近年来,各地又开始重视对古代书院的研究,有的地方恢复了一些书院,但恢复数量有限。有的书院是新建起来的,如宋代四大书院中的应天府书院,是彻底新建。而岳麓书院、嵩阳书院等都在原址上,保留了古建筑。

当有媒体问及,当代书院和古代的书院有何不同?古代书院是不是已经彻底消亡,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?

“古代书院没有彻底消亡。”韦力这样回答,比如岳麓书院,到今天仍然是湖南大学的一部分,并且学者仍然在这个地方讲学,进行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,搞得有声有色。“我到岳麓书院去参观的时候,依然能够感受到它的这种气势。所以岳麓书院一直延续到今天,仍然是教学重地。”

韦力感慨,《书院寻踪》的问世,是为了讲书院藏书的历史,并非只谈书院本身,而本世纪以来各地新建的书院,没有看到有什么藏书,这才是传承中华文化的一种遗憾。谈及个人寻访过程中印象最深的一座书院,韦力特别提及江西华林书院。“我没想到它建在深山里,四周都是荒野,路上也看不到村庄。我想,古时候应该比现在人口更少;当然今天的山里也有书院,但多是休闲雅玩的地方,显然不是读书的地方。”

“古代的书院及其藏书,为什么会这样?深藏于大山里的书院,谁会来呢?”韦力依然充满好奇,对中国古代与书籍相关的一切,都在他的寻访之列,而依然还在寻访路上。

性,又有文物性,因此很多人走入古书拍卖行列。但是古籍拍卖跟经济有密切关联,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,无论古籍拍场还是古旧书市场,书价都有一定的下滑。古籍虽然是文物,但有其特性,不同于其他文物古玩。如果站在宏观角度看,古籍市场始终是向上的趋势。出现这种结果,一是读书人对古籍的热爱,二是前几十年古籍太便宜了。

草地:据您观察,目前的藏书市场处于什么状态?在这个时机寻访书院,是否能进一步促进藏书市场的复苏?

韦力:目前的情况比较特殊,因为赶上了新冠肺炎疫情,古籍拍卖、古旧书会都无法举行。近几十年来,这两个市场都是定期举办,比如拍卖市场,基本固定春秋两季各举办一场大型拍卖,中间穿插几个小型拍卖。因为疫情的影响,2020年春拍几乎全部停止了,有的移到了秋季举行,而秋拍则只能推到2021年。

2020年举办的几场古籍拍卖,虽然从整体上不如以前景气,但是有些稀见本的价格却高于以往。可见有些爱书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,都不能放弃对传统典籍的钟爱。

草地:在古籍保护和“活化”方面您有哪些经验分享?

韦力:您所谈到的“活化”,我想更多的是指古籍整理吧。这分为两部分,一种是对珍本古籍的影印出版。这对研究者最为有利,因为古籍本身是文物,每翻阅一次都对它有损伤。但书是用来读的,如果为了保护而不让人翻阅,那么古籍就成了“死书”。如何解决典藏和使用之间的矛盾?影印出版是最佳手段。有些古籍留传甚少,有的也已成了孤本,古籍影印能够将一部书化身为千百,使得孤本不孤,且能让更多的人来利用文献,这是很好的一种保护方式。

“活化”的另一种方式是点校整理出版。这种方式费时费力,但更利于普及。因为古书没有标点,一般读者有阅读障碍,经过点校整理之后,能够使古籍更加普及,其售价也会比影印出版便宜很多,这同样起到了普及的作用。